

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王 滨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王 滨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王滨著.--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608-4440-4

I. ①市… II. ①王… III. ①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研究—中国 IV. ①F1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4371 号

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王 滨 著

责任编辑 杨宁霞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陈益平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7.5

印 数 1—3100

字 数 350000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4440-4

定 价 36.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15
一、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15
二、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	19
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22
四、市场经济的缺点分析	33
第二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38
一、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及其实践	38
二、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反思	45
三、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48
四、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两种改革路线的比较	57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	75
一、制度、经济制度与基本经济制度	75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所有制结构	81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	85
第四章 社会主义市场主体的确立	100
一、市场主体的涵义与构成	100
二、企业是市场经济的首要主体	102
三、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	109
四、用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国企	114
五、国企改制与国有资产退出引发的争论	118
第五章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125
一、市场体系及其完善的基本要求	125
二、商品市场	128
三、要素市场	134

四、市场组织	147
五、行政区划引起的市场开放和统一问题	150
第六章 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与市场规则	155
一、市场机制与市场规则是市场运行的保障	155
二、供求机制与价格机制	158
三、竞争机制与风险机制	162
四、三大市场规则	165
五、通过技术创新促进市场良性竞争	172
六、市场道德与市场信用	176
第七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	180
一、宏观调控的基本内涵与目标	180
二、我国几次宏观调控的历史回顾	189
三、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	194
四、市场经济下的计划调控	204
五、宏观调控的非经济手段	206
第八章 中国的对外开放之路	208
一、“对外开放”的原因及取得的成效	208
二、“对外开放”的内容和形式	212
第九章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	220
一、政府体制的深化改革	220
二、收入分配体制的深化改革	228
三、财政与税收体制的深化改革	237
四、金融体制的深化改革	244
五、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深化改革	255
结束语——正视问题与挑战	264
参考文献	272
后记	275

导 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有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十一届三中全会高扬的改革精神、开拓精神、民主精神、务实精神,后来成了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强大的精神动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首先提出的。自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始终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我们无论是对已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总结,还是对未来发展的展望,无论是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和挑战,还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 and 办法,都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掌握。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进行了深刻地描述,首次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战略任务,这“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可以作为我们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最为清晰的线索和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乃至对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创新。

要全面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首先要研究和领会经济建设,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此为出发点来看待其他三个建设。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经济发展是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在实践中,经济建设与其他三个建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同步推进的,因此需要我们从系统论出发,以社会大系统

为视角来研究经济建设,以及与经济建设相联系的社会各个方面。

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构成了中国近三十多年来经济及社会发展的主线。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进步,中国的改革开放将社会主义道路同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进而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指导,确立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进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伟大实验,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一位哲学家说过这样的话:“人类的绝大部分灾难,乃是根源于人类的无知。”人与其他生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会理性思维,有对未来的想象力,这既是好事,同时也是坏事。好事是因为人可以有预见力,可以调整自己的行为 and 前进方向。坏事是因为人的判断、预见、理性常常会出现错误,造成道路选择上的偏离和失误。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种在进步和退步的辩证关系中曲折前进的方式正是人类活动的必然趋势。因此,要全面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首先需要有正确的方法论来指导和方法论框架来规范。也就是说,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改革实践,首先需要具有正确的思维方式、思维视角和思维素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多次向世人表明,他们的学说正如他们自己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

我们要想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法论或者说要想具备必要的思维素养,至少要有如下五个方面的思维能力,即敏锐性思维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向前看和向后看的思维能力、深刻性思维能力和科学性思维能力。

1. 敏锐性思维能力

敏锐性思维表示分析任何事情,特别是分析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要有敏锐的头脑,比如对政治、对微小的环境变化、对市场变化等保持思维的敏感。敏锐的反面就是刻板,思维刻板的人,不能容忍也不能适应变化,对变化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拒绝变化。我们常将企业家比作一群敏锐的人,这首先就是思维敏锐,所以企业家的一个定义就是:企业家是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能够敏锐地发现市场获利机会具有洞察力的人。

之所以强调对政治的敏锐,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首先是党的领导和政府推动的,当然并不是说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不重要。从历史上看,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理论和改革目标,是中国一百多年来对国家现代化道路艰难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页。

索和深刻总结的结果。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元代和明代,乃至清初,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上还处于前列。但自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欧洲国家相继走上现代化之路,中国却不断退步和落后。甲午战争割地赔款之后,沉睡了近百年的中国人才惊醒,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了寻找富国强民之路。结果,又经历了百年,一批批国家超过了我们,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也实现了所谓的“经济起飞”。同属于社会学家眼中的儒家文化圈,为什么它们能抓住机遇实现现代化?而我们却失去一次次机会呢?世界现代化历史经历了英国的称霸,法国、德国与美国的赶超,苏联与日本的崛起,“四小龙”的起飞。这几趟车我们都没有赶上。

为什么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经济发展机会?为什么我们用了百年也没有实现国家的昌盛?中国受到现代化先行国的挑战,并对之做出应战在时间上不晚于日本与俄国。中国在鸦片战争后,1842年就被迫开放,日本是在美国威胁下于1853年开放,1868年开始了明治维新,俄国现代工业也是从1861年开始的,为什么它们赶上了西方国家,而我们却没有赶上?

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它必然都面临着资源有限和人的需求无限这两个约束条件,能够在这样苛刻条件下发展就必须采取两种变革:一是建立一个有效分配和合理利用经济资源的经济体制;二是有一个具有现代意识,并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政府。而上述的经济体制的基础就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否存在较为发达的市场体制和体系,是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的一个分水岭^①。各有各自的国情,有各自的市场体制和发展特色,但让市场机制在分配和利用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却是任何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所必须做到的。但仅这一点我们就花了百余年才明白。从这两条看,新中国成立前,我们既没有富有现代意识,并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政府,更无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来有效分配和利用资源。当外来力量挑战时,强有力的政府会通过内部变革,使社会走上现代化,但近代恰恰需要强化政府推行市场化时,政权却腐朽了,而这个腐朽的政权在保持对外封闭、压制国内私人企业成长上却表现得游刃有余。

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强烈现代意识,决心致力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政府有了,具备了第一个变革的条件,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经过艰难探索的正确选择,但后来由于盲目照搬苏联模式,我们建立了一个与苏联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套体制是以价格的严厉管制和行政命令调控为主要特征的,不可能产生现代化,结果国民经济长期徘徊,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拉大。

^① (英)彼得·罗布森,戴炳然等译,《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

正是因为我们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竞争性的市场体制是分配和合理配置资源的最有效体制。没有认识到市场竞争和自由企业制度是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中国同样需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结果,中国的现代化历程走了很多的弯路,留下数不清的教训。直到 1978 年,邓小平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国才由此真正开始了现代化的新历程。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这一切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人口、资源环境、政治制度压力重重的约束条件下取得的,是在国际上“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外在压力条件下取得的,经典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国际社会也更是关注中国人所创造的奇迹,并用“中国模式”来加以概括,尽管“中国模式”难以简单描述,但它至少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引导和推动。

对于中国的快速发展,经济学认同的解释是: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保证中国制造的产品具有价格优势,中国于是便成了世界加工中心,以此支撑多年经济增长。上述论断自然有道理,但世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有很多,劳动力比中国还廉价的也有,中国为什么有其独特优势,保持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呢?诚然,劳动力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促使其成为经济竞争优势,还需要其他条件配合,经典经济学认为这就是经济制度,即经济市场化的配合。但以市场化程度衡量,中国并不比一些竞争对手更加市场化,经典理论中,各生产要素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整合在一起,形成生产能力,创造产值的,而中国经济运行的最大特色是“两只手”同时整合生产要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治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共同起作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出手,将市场化条件下本来不可能形成生产能力的生产要素聚合起来,将闲散的生产要素聚合在一起,快速形成了生产能力。

政府强力介入并不难,但如何形成竞争优势呢?中国解决了这些问题,一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巨大,且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二是国有土地保证了政府可以以令投资者满意的方式低价批租给投资者,使投资方无需与独立的土地所有者和利益主体讨价还价,同时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增加税收,进行城市化建设。三是政府可以为投资者提供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且尽可能保持已有汇率不变。这几个方面必然会刺激投资,提高竞争力。这些只有在政府强力介入下才有可能实现,这就是中国经济与众不同的原因,也是所谓“中国模式”离不开政府参与的原因。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间,社会矛盾凸显,社会一旦出现大的动荡,不仅改革难以进行,而且既有的改革成果可能毁于一旦,因此,经济发展必然要考虑社会稳定,……这种跳出经济看社会的思考就是政治思考。可见,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有敏锐的政

治思维。

不仅在思考中国问题时需要政治思维,在思考世界问题、思考中国与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关系时,同样需要有政治思维,学会透过政治的表象看其经济的本质。比如,美国在政治上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在军事上对世界的控制,其背后都是为了维护美元的国际结算地位,维护美国的石油供应。再如,2009年12月,美国标准普尔下调了希腊信用展望级别,另一家机构惠誉也将希腊的主权信用级别由A下降至BBB+,随后,另一评级公司穆迪也将希腊的短期主权信用级别降低,由此引发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而这三家评级机构两年前在美国的次贷危机中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将次贷资产支持的证券化产品评为“高级别、低风险”的资产,让投资人忽视了风险,从而遭受巨大损失。其实,这三大机构早就知道希腊隐瞒债务规模的事情,根据客观公正的原则,他们应该早在两三年前就提出警告,给投资者适时的提醒,但是这背后总有政治因素的参与,并配合投资银行共同盈利。中国拥有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政府总负债只有GDP的20%左右,但标准普尔给中国的长期主权信用只有A+,美国债务规模已经占美国GDP的95%,三大评级机构给出的评级都是AAA。^①这说明,经济行为并非纯粹的,背后总有政治行为参与或受政治行为的影响。

2. 创造性思维能力

创造性思维是人类的高级心理活动,指思维不仅能提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内在联系,而且能在此基础上产生新颖的、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前所未有的思维成果。它具体包括思维的广阔性、流畅性、求异性、灵活性、变通性、独创性、批判性等等。创造性思维要求打破常规,将已有的知识、经验进行改组或重建,创造出个体前所未知或社会前所未有的想法。

从创新思维的对象和成果看,创造性思维产生的创新结果包括:科学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体制创新、发展模式创新,还包括观念创新、思维创新、理论创新等。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每一进程,无一不是打破旧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体制规则的束缚,大胆突破原有观念、旧体制障碍的结果,不论是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关于姓社姓资的大讨论,还是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为辅,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从制度体制的不断创新上,都反映出创新思维的结果,这种创新思维已经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表现在政府管理上的制度创新,还广泛表现在基层大众的首创精神上。因为中国的

^① 徐明棋,《三大评级机构是市场动荡的推手》,载《文汇报》2010年5月21日第5版。

改革不是先设计再行动,而是边探索,边找思路,边找办法的。

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是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里程碑,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上不断地创新和与时俱进。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将我们党在新时期以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中相继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整合为一个统一整体,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对这一体系的内涵进行了科学阐释。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里,将“解放思想”看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经验和法宝,他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①

做到创造性思维,一是要有创新思维意识,就是要将创新变为自己的内在习惯和自觉行为。敢于提出新观点和新见解,敢于批判、怀疑,善于修正自己的观点,适应变化,与时俱进;二是善于创新思维。即善于排除阻碍创新的思维障碍,同时利用创新思维方法。任何创新设想的提出,都是相对于以往人的思想观念上一种或多种思维障碍而言的,谁能突破障碍,谁就能创新。人的思维障碍是因为以往所受的教育、社会习俗,以及常规见解和长期习惯而形成的,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危害性。克服思维障碍的关键是认识障碍有哪些具体表现,并有针对性地加以克服。

克服阻碍创新的思维障碍可从以下十个方面入手,即:破除思维定势、不迷信书本知识和权威、保持批判和质疑精神、打破已有的规则、向唯一性挑战、变直线思维为变通思维、排除问题情境的干扰、变简单思维为复杂思维、变夸大问题为简化问题、摆脱解题条件的限制。

以往的经验和处理问题的方法,经过一定的重复,会在人的头脑中形成一种神经联系,遇到问题时,人们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老办法进行,这就是思维定势。当面对新问题,需要开拓时,定势就成了思维枷锁。比如,过去很长时间,在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上,我们始终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存在着思维定势,在道路的选择上也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同时也缺乏批判精神和质疑精神。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要从破旧立新角度分析,也要求我们打破学科界限和线性思维,从跨学科角度来理解和把握这一重大主题。

邓小平始终反对教条主义,他多次提出,中国的改革就是不惟书本、不惟已有教条,而是应该看准了就大胆试验,大胆尝试。邓小平曾说过:“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创新思维就需要有向“以往做法”和“不可能”挑战的勇气。生活原本有无限的可能性,只因为我们不尝试。不尝试就会派生出许多的不可能,许多的不可能就会累加成重重的困难,面对困难我们就会退缩,从而与成功无缘。有人总结出以下扼杀创新的词语:这简直不可能,这根本办不到,这些事想也别想,专家权威都认为不可能……这些话成为我们面对棘手问题最方便的遁词。生活中也许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不成功是不尝试或尝试不够,所有成功都是在N次失败基础上又加了一次尝试。因此伟大诗人泰戈尔说,仅仅站在那儿望着大海,你根本没法横渡它。

3. 向前看和向后看的思维能力

向前看的思维就是要站在现实看未来,使思维具有前瞻性、预见性和战略性。前瞻性、预见性需要认识现实,更需要研究历史。战略思考对认识现实问题是一个全新的角度。一个有希望的人是能够向前看的人,一个有生气民族是能够向前看的民族,一个有活力的理论是向前看的理论。

有人讲,人类最大的失误是战略上的失误。因为我们今天的一切是在执行昨天制定的战略,明天的结果如何,取决正在执行的今天制定的战略。因此,无论是认识过去的经济发展,还是规划今天的经济发展,都需要从未来角度考虑,针对未来制定的行动就具有战略意义。比如未来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未来可能的社会矛盾、未来国际竞争问题、未来发展可否持续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预见就必然反映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十七大围绕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从八个方面对经济建设的战略任务作出部署,这些部署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它们包括:一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二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三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四是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五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六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

系;七是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八是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显然,自主创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都是我们今天做得不够的,而未来又是极其重要的。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所谓向后看,就是要看过去走过的路,有历史感,向历史经验学习,有反思精神,过去、现在和将来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序列,在思维中不应该间断。历史是过去和今天的对话。了解今天的最好方式就是了解历史。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读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市场经济建设既是一个现实问题,又始终是一个历史问题。需要从现实视角和历史视角同时来认识。许多现实问题可以从历史中找答案,而未来可以从现实中加以把握。

2003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集体学习,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教授、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就“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这一题目进行讲解。两位教授就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这九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及国家兴衰经验、教训进行了讲解。学习结束后,胡锦涛发表讲话说:“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 and 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提高治国理政的才干。”2004年,中央电视台制作了这九个国家发展历程的大型电视片《大国崛起》,该电视片播出后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中国毕竟是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很多国家已经走在我们前面,经历了我们现在正在经历或还没有经历过的历程。在这个历程当中,它们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多。中国正处在逐步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当中,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如何走?为寻找答案,我们需要学习历史和深刻反思现实。

4. 深刻性思维能力

伟大导师恩格斯有句名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

没有理论思维。”^①哲学思维就是具有深刻性的思维,它可以做到思维的全面性、概括性、抽象性、辩证性、思辨性、猜想性,做到透过表面揭示实质、透过现象看本质,自觉地用联系的、辩证的观点看问题,看到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可以做到将任何观点放在理性中审视,用理性去批判,这就是所谓的问题意识,从问题入手研究。比如,一些具体的改革方案、路线的出台经常会出现争论,争论一旦深入就会进入哲学层次,成了哲学的争论、理念的争论,争论的胜利自然是哲学理念、哲学背景的胜利。任何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肤浅的、表面的现象出发,提供现象的描述,人云亦云;也可以从深层次的、本质的、联系的和辩证的角度出发,分析深层矛盾,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辩证地扬弃。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或许是当今世界上变化最大、发展最快、矛盾最多、问题最复杂的国家。几乎所有的西方思想者都愿意将中国视为自己知识产品的“跑马场”,开始竞相地“跑马圈地”。在影视、快餐饮食、娱乐、图书、商品、教会等一切舶来品的背后,都或多或少地附着外来思想的痕迹,每种思想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宣扬着自己的价值观和对世界的解释。如何面对这些缤纷杂乱的思想输入?如何在纷杂的观点中不迷失方向?如何确立适合我们自己文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价值体系?这些问题一直是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处理的,而分析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工具就是哲学的思考。

数十年来,一些西方政要及学者们一直没有停止用全球化、信息自由化,特别是市场自由化理念,企图改变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进而将中国的政治、经济 and 思想文化体制彻底西方化。回顾历史,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任何想吞食和同化中国文化的行为,最终都是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面前一败涂地。可悲的是,一些中国学者也时不时地发出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或明或暗地鼓动全盘西化,尤其是每当国家遇到困难、挫折和出现问题时,就会出现一些声音,抱怨我们对西方学习得不彻底,接受得不完全,视西方思想为救世良药,这已经成为某些人内心深处浓厚的思想情结。

事实上,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在不断地学习西方,但学习的同时我们却有了自己的理性反思,那就是全面照搬注定要失败,我们只有将中国文化的优秀品质继承和发扬,并实事求是地看待各种思想观念的真理性、适用性,才能在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凸显出我们自己文化的优势。我们强调过发展就是硬道理,结果各地都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中国是个大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每一项改革都不免会引发一些矛盾,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没有高增长,就无法压制危机,润滑社会。当经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4页。

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时,我们就要解决民生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因此,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同样需要辩证法指导,特别是需要系统思考。无论是当年毛泽东提出的论十大关系,还是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的“五个统筹”思想,都是要求全面思考、辩证地处理各种关系,尤其是当前最为迫切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问题。恩格斯曾说过:“事情不在于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①将这句话扩展,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可以从社会中找到辩证法的这些规律,并从社会实践中加以阐发。

矛盾分析方法是哲学的重要思维方法,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复合体,任何时候都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任何矛盾都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分析问题就首先需要认识到矛盾的存在,正确地处理两者的关系,掌握这个度,才能把握方向。比如,管理的实质就是处理和平衡矛盾,寻找合适的度,从一定意义上说,管理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大到国家的发展,小到单位的治理,随时随地都要面临和处理如下一些矛盾:规范与灵活、风险与收益、优秀与平庸、权利与义务(责任)、理想与现实、多样化与单一化、生存与发展、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发展与统筹、对外开放与贸易保护、引进外资与自我发展等。

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是哲学给我们的重要思维原则和方法。许多人善于把问题抽象化,习惯从普遍意义上、一般意义上找理论,结果常常将理论僵化或教条化,但任何问题都是具体的,都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环境的产物,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照搬照套就意味着失败,因此要学会变抽象思维为具体化思维。

5. 科学性思维能力

科学性思维就是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精神为基础,利用科学的方法、尊重科学研究的程序、规则,尊重科学事实、科学的真理性,同时还要充分尊重科学的探索性和过程的不确定性,结论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

按照西方一些学者对科学的划界标准,人类所有的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供实证分析和综合的,这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就是说,凡是可以通过观察和实验方法进行检验的观念就属于这类;另一类是无法实证的,比如文学、艺术、宗教等,其理论和学说常常出现流派,而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划界自然存在狭隘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页。

常常以自然科学为标准,强调具有严谨的概念、定理、定律、推论组成的体系才可以是科学的,能够在实践中证实的才是科学的。

中国人对经济学历来作实用主义的理解,经济学在中国就是经世济民,学以致用,难以称得上学问。经济者,经世济民也。世者,人类社会也;民者,社会主体也。在“民”与“民”之间拉出一条“需求和满足需求”的线,连结成一对“商品供求”关系,这就是“经”;而“民”与“民”两个“社会主体”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这就是“济”。另一方面,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努力进行本土化的中国理解外,还要借鉴西方成熟的各种经济学学说。

古希腊百科全书式学者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有大量经济学思想,其观点是: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三位一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被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亚当·斯密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因此,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政治视野的经济考察,更是经济学发展的起步基础,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的学说,研究政治与经济的内在联系、相互作用及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

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还需要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基础。“宏观经济学”一词,最早是由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在1933年提出来的。经济学中对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与考察,可以上溯到古典学派。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的《经济表》,就是经济学文献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宏观分析。然而,在古典经济学家和后来的许多庸俗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对宏观经济现象和微观经济现象的分析都并存在一起,并未分清。特别是自所谓“边际主义革命”以来,经济学家大多抹煞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无视国民经济总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只注重于微观经济分析,以致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在一般经济学著作中几乎被淹没了。

但传统庸俗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袭击下失去了效力,随着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宏观经济分析才在凯恩斯的收入和就业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当代经济学中的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宏观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它主要考察就业总水平、国民总收入等经济总量,因此,宏观经济学也被称作就业理论或收入理论。宏观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等分支。

微观经济学又称个体经济学、小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对称。微观经济学主要以单个经济单位(单个的生产者、单个的消费者、单个市场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单个生产者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分配在各种商品的生产上以取得最大的利润;单个消费者如何将有限的收入分配在各种商品的消费上以获得最大的满

足。同时,微观经济学还分析单个生产者的产量、成本、使用的生产要素数量和利润如何确定;生产要素供应者的收入如何决定;单个商品的效用、供给量、需求量和价格如何确定等等。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其中主要有: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包括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均衡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等。

经济学家萨穆尔森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以经验为依据的科学。它以解释我们身边的世界为首要目标,然后帮助我们基于正确合理的经济原则来设计经济政策,以提高国内外人民的生活水平。^① 正是因为经济政策是人来设计的,常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因此难以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答案。经济学家既需要有严肃的实证研究本领,还要具有猜想的本领,更要有人文关怀和对道德良知的诉求,这些又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狭义的“科学”所能够包含在内的,因此,所谓科学性思维能力中的“科学”是广义的科学,这个科学包含实证化的自然科学,也包含仁者见仁的人文和社会科学。

20 世纪以来,经济学家越来越偏向于采用数学方法来分析问题,似乎有了数学,经济学才更加科学了,1968 年设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更为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起到了促进作用。早期数学家所使用的数学工具仅限于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更为高深的现代数学比如博弈论等使现代经济学理论上更加抽象化。弗里德曼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在其著名的《实证经济学方法》一文中断言:“对于人类社会我们完全可以像对自然界那样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理。”^② 用这样的认识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分析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显然是不够的,甚至是行不通的。人与人的互动性、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道德、情感等相当大部分是无法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的,因此,不能说不用数学方法而是经验性地描述就不是科学的。

同理,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可狭义地理解为像自然科学那样有共同的评判标准,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经济学必然要考虑其国民性、国别性。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国经济学也发生了很大的分化。经济市场化自然要求广泛地从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引入已有的经济理论,但又不能照搬照套,又不能完全否定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必须通过结合,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否则经济学就没有生命力,这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① 保罗·萨穆尔森,萧琛等译,《经济学》中译本,第十六版,华夏出版社,1999 年版,第 5 页。

② M 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王学武等编,《西方经济学经典选读》,海天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51 页。